

忆往昔 羽也

从几中今昔回
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忆往昔

——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

岭光电（彝族）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志方 张 立

封面设计：万强麟

忆 往 昔

—— 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

岭 光 电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85,000 插页1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精800)

(平装)ISBN 7-222-00174-3/K·44

(精装)ISBN 7-222-00175-1/K·45

定价：平 2.00元
精 3.75元

25010



作者壮年时期的照片

131320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总 序

刘尧汉

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南侧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的乌蒙山和云南的六诏山（乌蒙山脉的分支）、哀牢山、蒙乐山，北侧分布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就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北境濒临金沙江乌蒙山脉区域的元谋县。彝族是我国滇、川、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历来只凭书本治学的地方史家，都说彝族是从西北甘、青迁人的古羌戎（或古氐蕃）与当地土著融合的遗裔。自从不久前考古发掘出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从而可说，甘、青古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元谋猿人的子孙散布于全亚洲乃至从中国东北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大陆，为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至于迁往甘、青为远古羌戎，则继续往西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往东迁达山东半岛而为远古炎帝神农民和周代所封齐姜（即羌）这便很自然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同样可说，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形成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维族）、吕振羽四大史家，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致认为，如果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写好中国通史。目前尚健在的史家白寿彝同志（回族）所写巨著《中国通史》，也强烈地具有同样的观点。然而，如果依旧停留在从书本到书本的写法上，尽管具有如上所述的正确观点而无具体的新内容，要写出一部包括各族新资料的中国通史，只是空话罢了。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根据哀牢山一个彝村的实地调查所获新资料写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的一份手稿，寄请范老审阅。我和范老从未面识，他却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刊上，将拙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的用意在于鼓励青年做研究工作，不宜只停留在书本上兜圈子，还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作实地调查，寻觅现存的活史料，以补书本之不足。范老的勉励，一直鼓舞着我坚持走实地调查的道路。倏忽三十年，我已年逾花甲。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近年来我带领彝族男女青年往返于金沙江两臂滇川黔三省山谷间，曾大雨淋漓骑入哀牢山，顶烈日爬鲁魁山（属六诏山脉），冰天雪地徒步登乌蒙山，不分冬夏往来于川滇滇大小凉山，为的就是继续寻访“山野妙龄女郎”。至今“山野女郎朱颜在，鬓白男女志未衰”。

今年（1984年）2月上旬，我把拙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概要”^①，寄请中国文化思想史家上海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审阅并请他赐序（我和蔡老亦未面识），他在序题为《中国各民族的血统与文化》的序中^②开头便说：

^①载《文汇报》1984年4月9日第3版。

现今研究中国通史尤其是上古史，原始社会史部份，再也不好停留于书本上了，不仅要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相结合，而且要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结合起来研究的，有王国维与其他考古家；把书本与社会历史调查结合起来研究的，后面我要说的刘尧汉教授就是其中一例。

他还正确地指出：

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比之书本的材料，是一种未成文的活史料，这种活史料有时要比死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至少也是可以互相参考的。

蔡老在文中末段又说：

现在云南省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刘尧汉教授以彝族学者而兼任所长，真庆得人。彝族是我国现在占人口较多数的兄弟民族之一，我很盼望其他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齐，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研究。有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历史，才能写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通史之类的著作。中国文化通史必须建立在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化专史的基础上，也同于中国通史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专史的基础上，这就不待多说，大家都会明白的！

蔡老把我与王国维相并提，我不敢当。蔡老十分谦虚，他以年近八旬（1905年11月10日生）的高龄，看了拙著之后，还说他更加不满足于过去书本材料，而期望“趁机补课”。在他给我的信里说，当年（1984年）暑假，他很想往西南山区一游。因身体条件，未能成行。这反映了民族学资料即活史料的价值，日益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同样，我们从事民族学的

人，也要更重视研习其他学科，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1985年8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教授，为我与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一书所写序言中说：

我们常说，历史学有三重证据：一是文献，一是考古，一是民族调查；第三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是过去历史的重现，是时间的倒转，是转瞬即逝的良机。

他在序言的末段中又指出：

我们不读中国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能了解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更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难解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蔡老和杨老，南北异居，不约而同。对于民族学、各少数民族史、文化史、彝族文化史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成果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其正确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彝族共有545万人口（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居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一壮，二维，三回），历来被视为文化落后；因而在文化上的地位，或许是在第四十位之后了。彝族的文化既然落后到这样的地步，我竟然要主编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而写书的人又多是彝族青年，并未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只是高等院校、大专、中专毕业的青年。

我却认为，能获得硕士、博士的学位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能干实事；能获得高等院校的文凭固然也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水平。那么，怎样衡量水平呢？我的浅见是：任何一篇文章或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其新内容或是新观点，才有学

·
价值。我们编的这套丛书预计二、三十本，除了我和卢央副教授各自写一本，两人合写两本（共四本）之外，大多数是我指导的青年们写的。写作的方法是脚踏实地，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活史料），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便是科学论文和专著产生的过程。我就这样带领新战士，走新路子，出新成果；这也是我不拘一格培育中华儿女的新方法，是一项培养人材的大胆试验。

总之，我指导青年的研究方法，是把从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配合，即用活史料给死史料注射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多富有山野味，其中或多或少也杂拌着梅味乃至洋味。总之，它们都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却别有风味。以飨读者和大方之家，请择可口者品尝之；切盼给予鉴定，提出批评！现举15本书稿的提要为例：

（1）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已出版）

中外不少学者如闻一多、周士一、潘启明、莱布尼兹、李约瑟等指出：中国科技文明，主要出自道家、道教及远古伏羲。但他们未明其源头究在何处。拙著旨在究明其源头出自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两侧哀牢山、乌蒙山、凉山彝区原始道教的彝族虎宇宙观，这种原始宗教哲学，由彝族十月太阳历所表达。详见拙著。

（2）〔彝族〕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已出版）

历来认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

国，中国居于末位。历法是衡量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一个月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它始自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族部落时代，不仅渗透中国文、史、哲各领域，而且把中国文明史追溯到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之前。本书对此专作论证。这为振兴中华以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建设“四化”的新中国将起振奋作用。

(3)〔彝族〕刘尧汉、卢央《中国考古天文学的一大发现——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

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特点，是按天文点（冬至、夏至、大寒、大暑、春分、秋分等等）来定季节，因此它的季节性很准确。它观察太阳运动定冬至，北斗柄指向定寒暑。滇、川、黔大量残存的彝族向天坟是综合十月历两种观测方法的观象台或天文台，在中国墓葬方法上独具一格，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里别有特色，美洲土著印第安部落玛雅人金字塔与之相似。它在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4)〔彝族〕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哲学和科学意义》

四川凉山州德昌县金古氏族的一位毕摩甲巴拉伙比古（1934年，58岁），他尚能记忆彝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虎星三十六日占法”和“虎星九日占”、“虎星八日占”。彝族虎星三十六日占、虎星九日占、虎星八日占，各是一个月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太阳历的三种星占法。这三种占法分别表现了彝族的虎宇宙观、虎图腾崇拜、十月太阳历及其阴阳（雌雄）观。这是彝族原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概括。

(5)〔彝族〕彭强兴记录《凉山彝族星占师海惹巴玛回忆录》

云南凉山宁蒗彝族自治县的凉山彝族，是十八世纪时从四川凉山迁入的。星占师的法事属于原始道教的领域，其中含有哲学和科学。[1]（彝族）卢央《彝族星占术与现代天文学》。

《史记》把祭司称为“日者”，又将其法事称为“龟策”，并写出《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在《龟策列传》中说：

“四夷各卦卜”，《日者列传》引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2]今天，我们记录彝族星占师的回忆录，从中可研究其原始思维和原始科学的信息符号系统。

[3]（彝族）卢央《彝族星占术与现代天文学》。

综合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吉伙部落什列惹古民族星占师甲巴拉伙比古所述彝族“虎星占”和云南凉山宁蒗彝族自治县曲涅部落海惹氏族星占师海惹巴嘎回忆录的资料，给予科学的解释，并阐述现代天文学的由来。[4]（彝族）杨和森《图腾层次论》（已出版）。

“图腾”是原始母系氏族制时代用动植物及其他自然物作为区别氏族的标志，并认为本民族始祖与所奉图腾物有血缘关系，且可互相转化。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众多氏族曾一一记录其图腾，惟未察明印第安人最早的图腾即原生图腾，也就未能区分因人口增殖、氏族增多之后，不断演生的图腾及其层次。

中国历史学者运用“图腾”概念来阐述夏、商、周的图腾，各有多种；究以何物为图腾，众说不一。乃在于不能辨明其何者为原生、何者为演生的图腾之故。本书藉助于彝族现存众多图腾遗迹的层次，来辨别夏、商、周的原生图腾。

（8）〔彝族〕龙建民《市场起源论》

当前欧美学者都研究现代市场的未来，我国学者从本国众

多的小城镇出发来研究其发展前景。国内都在向前看，这是顺应世界潮流，而必须如此。本书则是从彝族的“十二兽”纪日集会到集场来考察我国小城镇及现代市场的起源，这并不是向后看；向后看也是为了要向前看，要鉴往知来。

我国西南滇、黔两省彝区，现在依然普遍地存有以虎、兔、龙、蛇、牛、羊、马等“十二兽”纪日的集场；各地众多“十二兽”集场，有些在荒野，赶场百姓无处避风雨；时逢集期，人们纷纷而至；眼看太阳偏西或大雨将临，人们匆匆离去。这样的集场，俗称“草皮街”或“露水街”；有些有若干草棚聊以蔽风雨，俗称“草棚街”；有些则有座商定居，开设铺面，门当户对，形成一条或数条小街道，这便是集镇；有的已有数条街道，解放前曾有围城，这便是小城镇。集场的空间分布增多和集期时间间隔逐渐缩短，小城镇也随之增多。

至于四川凉山彝族的中心区，在解放前还处于父系氏族制和民族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还没有产生集场。各民族各有其按“十二兽”纪日的不定期集会和集会场，以商讨氏族事务。凉山彝族的交换多借民族集会和集会场进行。

任何事物都曾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同样，欧美的现代市场，我国的大城市，小城镇也曾经历过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本书提供这样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序列，以探索市场的起源，供面向未来者参考。

（9）〔彝族〕朱琰元《彝语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

1980年进行全国地名普查后不久，有学者提出建立“地名学”。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当建立“中国民族地名学”。本书从彝语支地名出发来阐明建立“中国民族地名学”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

(10) 钱成润、〔彝族〕杜晋宏、〔白族〕史岳灵《彝汉“禄村”今昔》

费孝通教授青年时代在他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作实地调查，写了《江村经济》之后，四十年代初来到今楚雄彝州禄丰县城、效大北厂村作调查，写成《禄村农田》一书。大北厂早先居民是彝族，后来汉人迁入，彝族迁往本县山区基拉村。“禄村”是禄丰县，“禄丰”的彝义是石甌。

《禄村农田》一书根据调查资料，反映了中国工商业长期不发达是由于受土地及传统农业的束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者于1983年秋对“禄村”作了调查，旧时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11) 〔彝族〕普珍、龙建民《彝族“沙村”五百年》

四十年代中期，我就学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在费孝通教授指导下在今楚雄彝州南华县哀牢山沙坦兰和摩哈苴等彝村作社区调查，其研究成果，五十年代中期写成《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一个实例》一文手稿，经史家范文澜阅后，以《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赞许拙文为“山野妙龄女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3年6月，我指导这两位彝族青年，访问这位“山野妙龄女郎”，将谱写这位“妙龄女郎”的新篇章。

(12) 龙建民《凉山彝族父系氏族奴隶制土地租佃关系的典型研究》

列宁说过，在封建制社会谁占有土地谁就有权有势。在我国川滇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里，占有土地者并不有权有势，而

是占有入身者的奴隶主才有权有势。占有土地的奴隶可向其他奴隶甚至他的奴隶主出租土地，但他并不有权有势，他的奴隶主有权把他的土地牲畜没收并把他本人及妻女降为更低级奴隶。本书对此研究的成果，可补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中，奴隶制社会里土地租佃关系的空白。

（13）唐楚臣《彝族火神话与中华火文化》

彝族有丰富的关于人类用火的神话。彝族对火的崇拜，在其十月历中也有所反映。彝族十月历据北斗柄上指定大暑的盛大火把节。在楚雄彝州牟定县彝族所祀火神庙，有三十六个大火塘和七十二个小火塘。此“三十六”和“七十二”这两个成数，是一个月三十六日及一年十个月分五季每季两个“七十二”日的成数。彝族远古先民伏羲、炎帝在汉文典籍中被奉为火的发明者和火食发明者；又把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归之于伏羲和炎帝，认为“艾起羲、炎”。这也带有中华文化起于火的发明者伏羲、炎帝的含意。

源出于彝族远古先民羌戎伏羲、炎帝、黄帝为首的“三皇五帝”之原始道教的先秦方士和东汉道教的炼丹，发展到北宋炼出火药并产生出火炮；到十三世纪传入西欧，摧毁了西欧的封建堡垒，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是彝族远古先民羌戎及中华民族火文化对人类的一项重大贡献。

（14）刘尧汉《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

西方的未来学是近四、五十年来才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是从现状出发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事象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景。

三千年前我国商、周之际产生的伏羲之《易》（又称《周易》或《易经》）所载八卦，它专用以占卜吉凶，预测未来。因

而可说,《易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未来学”。当前,西方未来学只是根据现在预测未来,我国的《易经》则是总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以预测未来,即典籍所说“推往知来”。

伏羲则是彝族远古先民羌戎的虎氏族部落名号或首领,彝族的骨灰石缸盖上有八角,服饰、钮扣绘有八角,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有“八方之年”的周期;彝族占卜吉凶、预测未来有虎星八占。凡此都与伏羲八卦密切相关。

彝族十月太阳历有虎星三十六日占、虎星九日占、虎星八日占,都是十月历的占法。彝族的占卜便是彝族的未来学。是世界上最早的未来学。

(15) 刘尧汉《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三次决策》

第一次:放弃滇西哀牢山一隅的争鸣,扩大滇、川泸沽湖地区母系制调查的战果。

1979年开始,有一两位同志在昆明和北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我早年调查清代咸同年间哀牢山区以彝族李文学为首的彝、汉、哈尼各族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事实,提出否定和质疑意见。当时,有同志劝我与之争鸣。然而,另一项工作已摆在我的眼前,即在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区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左所区之间泸沽湖周围的彝语支摩梭人,迄今尚存原始母系制遗俗。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和我夫人严汝娴在滇属泸沽湖畔对此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原始遗俗作了调查,当时却无暇顾及川属湖畔。

1979年9月,我离京抵川属泸沽湖畔,先调查了全面情况。1980年3月至5月间,严汝娴约同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同志至此,参与了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共同写出了有关的调查报告。对泸沽湖地区的母系制获得了较全面的认识。

第二次：折脚伤头，坚持继续调查，使中年天文学者“英雄有用武之地”，为中国天文学史谱写新篇章。

1981年3月中旬，我和严汝娴从四川凉山州木里县西南隅俄亚区调查完毕，转赴东南隅屋脚区调查的途中，须经一段云南宁蒗县境，越过四千多米的雪覆山巅，严汝娴跌断右脚踝，我跌伤头颅，经宁蒗县委组织救护，送至渡口市乘火车抵西昌，住医院治疗。严折脚未复，我头伤初愈，我仍按预约致电中国科学院自然史所天文室助研陈久金、南京大学天文系副教授卢央来西昌，同我一道调查彝族天文学。由陈久金同志护送严至西昌。严汝娴为支持我们的工作，手扶双拐只身乘机返北京治疗折脚。陈、卢与我合作，将调查所获彝族固有的星座系统、星占学、十月太阳历等资料，写出《彝族天文学史》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第三次：缩短个人新著，为培养彝族文化新战士而驰驱滇、川、黔山区。

1983年10月下旬，当我把新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的“概要”（约五万字）写毕，我向妻女说，这是我数十年来从事彝族历史文化实地调查研究的代表作，“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我能呆在家里，写上二、三十万字，详尽论证，这多么好啊！但不辜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让我为《彝族土司制度》这个项目指导彝汉族中青年作实地调查，并允许我以智力支边的任务得再返三省山区，我应该对培养彝族青年竭尽绵薄，指导他们在实地调查的锻炼中做出成果。我常向彝老们和青年们说，我不是为培养龙家、普家、阿侯家、曲木家等等某一姓某一家的儿女，而是要培养彝族的儿女即中华民族的儿女，要这些儿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我确信：自学

成才，实践出真知的道路。我带领这些青年跟我一道攀登岩石累累的崎岖山路，从山脚一步一步向群山一个一个的高峰攀登，这符合任何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我期望他们艰苦奋斗闯出一条新路。

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民族研究所对我支边的支持，我不可能作出第三次战略决策，也就不可能产生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没有云南人民出版社惠予出版和该社副总编程志方同志甘当本丛书的责任编辑，也不可能使我主编的这套丛书逐步问世。特别是如果没有有关党、政、民族事务及文化教育系统各级负责同志的信赖和支持，这套丛书也就不能成套。

这套丛书从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开始，将陆续问世，接受中外学术界的检阅和批评。其中彝族青年作者，大多数本似不够水平乃至是很不够水平的。但我确信，通过艰苦的实际锻炼，虽愚必明，虽弱必强。彝族的文化是较落后的，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已有很大改变，但差距仍是不小。作为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人人有责为改变这种状况出力。这正是我离开书斋回到山野，就地取材，因材施教以培养人才的原由，也是我选择这种大胆试验的基础。

上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部分书目(十五本)内容举要即提要，在《彝族文化研究文集》所辑文章中很多就是它们相应题目的概要。

不难看出，这些专题及其著作的多篇多本，它们论述的彝族文化，并不局限于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山谷，已是登上金沙江南北两侧乌蒙山、凉山的最高峰，眺望全国，远眺全球。现列举数端如下：

①散见于经、史、子、集的“三十六”和“七十二”这两